

# 收入、社会地位与幸福感——公平感知视角<sup>①</sup>

徐淑一, 陈平\*

(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 广州 510275)

**摘要:** 从公平感知的新视角, 研究收入和社会地位对幸福感的影响.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 2012年和2014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 1) 收入对幸福感总体上存在正的影响; 但随着收入的提高, 幸福感对收入的敏感度在下降; 2) 社会地位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其在中国的贡献度已高于收入, 而且随着收入提高, 社会地位对幸福感的影响增强; 3) 公平感知对幸福感的影响日益重要, 其作用大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影响. 最后, 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加快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等建议.

**关键词:** 幸福感; 公平感知; 收入; 社会地位

**中图分类号:** F0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807(2017)12-0099-18

## 0 引言

### 0.1 收入与幸福之间的“悖论”

提高人民幸福感, 一直是新时期我国党和政府的重要执政理念之一.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 “中国梦, 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幸福感是指个体对其整个生活评价后总的主观体验, 在经济学中个体的幸福感是效用的合理代理<sup>[1]</sup>. 长期以来, 人们往往将幸福感与经济增长近乎视同意义, 认为幸福感的源泉在于收入提高. 这一观念在我国的现实体现在, 微观层面上个体努力追求收入增加, 宏观层面上经济增长成为各届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支配性目标(所谓“发展是硬道理”).

然而 Easterlin<sup>[2-4]</sup> 在一系列研究中指出, 虽然个体收入与幸福感存在正相关关系, 但随着国家经济增长, 国民的整体幸福感并未获得相应的提高. 此所谓著名的“幸福悖论”, 也称 Easterlin 悖论, 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微观方面, 诸多的实证研究表明人们的幸福感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很微弱, 甚至完全不存在<sup>[5-7]</sup>. 改

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 但我国居民幸福感与经济增长/收入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 尽管也有研究表明我国居民幸福感在近年来未有下降趋势, 甚至有所提高, 如刘军强等<sup>[8]</sup> 研究了2003年~2010年间, Bartolini 和 Saracino<sup>[9]</sup> 研究了2001年~2007年间, 但 Easterlin 等<sup>[10]</sup> 指出这几年幸福感的提高对比中国 GDP 的增长而言是不显著的. 更多研究表明, 近20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未带来国民幸福感的相应提高<sup>[11, 12]</sup>, 甚至幸福感呈现下降趋势<sup>[13]</sup>, 而且我国个人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实际上很微弱或者仅存在于低收入群体中<sup>[14, 15]</sup>.

对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矛盾现象, 出现了多种经济学的理论解释, 其中基于福利经济学的相对收入解释是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假说, 即收入差距与幸福感之间是负相关的, 缩小收入差距有助于提高幸福感. 即便如此, 这一理论假说也未取得实证研究的一致认同<sup>[1]</sup>, 有的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穷人和富人的幸福感具有不对称影响<sup>[16]</sup>, 有的研究还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性或者不存在相关性<sup>[17-19]</sup>. 这种不一致的现象在发展中国

① 收稿日期: 2016-05-04; 修订日期: 2017-02-1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473278).

通讯作者: 陈平(1965—), 男, 福建南平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Email: linschp@mail.sysu.edu.cn

家也存在<sup>[20, 21]</sup>。学者们对我国的收入差距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存在类似国外研究的不同结论<sup>[22-28]</sup>。

由此,要厘清幸福悖论的内在根源,需寻找更有效的视角予以观察和研究。本文拟从经济理论出发,借鉴社会学的概念和相关研究,从公平感知的角度,并结合社会地位因素研究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在建立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工具展开研究。

## 0.2 社会地位与幸福

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地位是指社会或某一群体中成员所取得的特定位置,其特点是:社会地位是由社会承认或公认的;任何一个成员要获得某一地位都必须具备相应的能力;一定的地位是人的一定权力、责任的象征<sup>[29]</sup>。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受尊重的程度、收入分配的优劣、机遇的多寡、个人才干的施展、自我实现的高低。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需求、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人们对社会地位的需求主要基于对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或者说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往往通过一定的社会地位才可以做到,正如 De Botton<sup>[30]</sup>指出高的社会地位是进一步获得更高收入和他人尊重的一个主要途径。因此,高的社会地位能够提升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已经得到共识<sup>[31]</sup>。

近年来,社会地位与幸福感的实证研究开始见诸相关文献,如史耀疆和崔瑜<sup>[32]</sup>研究发现社会地位是影响公民感受的主要因素;闰丙金<sup>[33]</sup>采用 CGSS2006 数据研究发现社会阶层以及社会阶层认同感的变化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刘军强等<sup>[8]</sup>在其研究中也通过人们社会阶层的自我评价考察了其对幸福感的影响。然而,现有的研究并未将社会地位与收入对公平、幸福的影响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在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的架构内,低层次需求多属于物质欲望,通过收入的使用可予以满足;高层次的需求更多属于精神要求,越需要通过社会地位的提高来实现。

## 0.3 公平感知的影响

如上文所述,幸福感与收入差距相关性的实证结论出现很大的差异,在笔者看来,可能是因为没有对公平的收入差距与不公平的收入差距作出

区分。福利经济学主张收入均等化,认为“分配越均等,社会福利就越大”,从社会整体效用最大化的视角来看,观点本身不存在争议。但从“效用”的角度来研究幸福感,关注的是纯粹结果的平等,而容易忽略该结果产生过程的公平性。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Hayek<sup>[34]</sup>早在 1944 年就指出,强迫个体结果的相同和平等,反而隐含着另外一种更大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对幸福感带来的负面效果可能大于通过收入均等化提高社会整体的效用从而对幸福感的正面效果,由此造成了幸福感与收入差距之间负相关的实证结果。

由此,不仅收入的多寡影响人们的幸福感,收入的公平感知也诠释着幸福感的高低。在收入与幸福关系的研究中,收入的公平感知日益为学者所关注。Alberto 等<sup>[17]</sup>用人们主观感知的公平解释了不同国家和地区收入不平等对幸福的差别效应,人们的公平感知高的国家和地区,收入不平等对幸福感没有明显的影响,而公平感知低的国家和地区,收入不平等对幸福感存在负的影响。这表明收入产生过程的不公平引发人们内心的不平衡,从而可能产生不幸福感。Hopkins<sup>[35]</sup>指出,经济实验也揭示了过程越公平,人们对结果的不平等越能容忍。Björnskov 等<sup>[36]</sup>的研究同样表明人们收入的公平感知影响收入不平等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人们感觉到越不公平,报告的幸福指数越低。近年来,我国学者开始关注人们的公平感知与幸福感之间关系,如袁正等<sup>[37]</sup>等基于 CHIPS2002 数据发现幸福感与收入不公平呈负相关关系;孙计领<sup>[38]</sup>运用 CGSS2010 数据,发现分配公平感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配公平感越高,收入差距对幸福感的影响越小;阳义南和章上峰<sup>[39]</sup>运用 CGSS 数据将收入不公平感结合社会保险研究其对幸福感的影响,并发现收入不公平感对幸福感的影响大于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李俊<sup>[40]</sup>将公平感和幸福感进行联立研究,探讨城市住房阶层的幸福感与公平感差异。

北京师范大学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所撰写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5》指出,近 30 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 80 年代初的 0.3 左右上升到现在的 0.45 以上,中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从 1995 年的 0.45 扩大到 2012 年的 0.73,顶端 1% 的家庭占有

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 25% 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 1% 左右. 收入和财产不平等如此巨大,显然不是个人先天禀赋和努力差异所能解释的,绝大程度归因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所存在的某些群体贪腐、权钱交易等为社会所诟病的财富牟取手段的诸种不公不当. 由此,在这一背景下研究中国的收入与幸福关系,在数额的多寡外,更有必要增加一个维度,即公平感知的维度方可更好地诠释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同时,这一维度不仅适用于收入,也同样适用于考察社会地位对幸福感的影响. 不公平感不仅和收入分配有关,与社会地位也存在联系: 社会角色不同,相应的不公平感也不同.

综上,本文引进人们的公平感知并结合社会地位因素探讨收入与幸福关系. 本文认为,根据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稳定的社会地位,可以获取归属感,发挥个人才干,使个人的能力和成就得到社会的承认,获得他人和社会的尊重,因而当人们财富达到一定水平后,人们更关注自身社会地位; 同时,影响人们幸福感的不仅仅是自身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的高低,还有他们对收入和社会地位获取过程的公平感知. 收入、社会地位和公平感知对幸福感的影响关系如图 1 所示. 本文将建立理论模型描述他们之间的关系,并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S) 数据展开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定量分析收入、社会地位和公平感知各自对我国幸福感的解释力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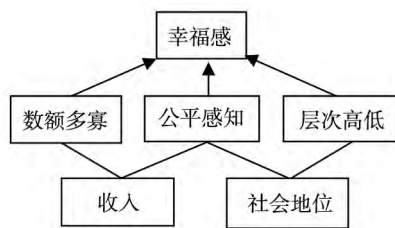


图 1 收入、社会地位与公平感知、幸福感关系图  
Fig. 1 The relationship of income, social status, fairness perception and happiness

### 1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本文采用人们在调查中对自身幸福感的评分作为个体效用的代理,这也是文献中的普遍做法. 文献一致认为这种测量富有研究价值,并且可以用来进行跨群体的比较<sup>[8]</sup>. 这种序数评分表现了

个体的效用偏好<sup>[41]</sup>,因此个体关于幸福的序数评分可以假设效用的单调函数,而且个体关于幸福感的自我评分是有比较意义的<sup>[1]</sup>. 参考 Blanchflower 和 Oswald<sup>[42]</sup>的理论模型,假定个体报告的主观幸福感或者生活满意度是其不可观测的效用的增函数

$$W_i = w(u_i) + \varepsilon_i \tag{1}$$

其中  $\varepsilon_i$  是误差项,反映了个体之间不可观测的差异,比如对幸福感序数的等级分类的主观理解的差异. 假定主观幸福感是效用的增函数,基于标准的劳动供给决策,个体最大化决策基于标准的效用函数

$$u = u(x, e, z) \tag{2}$$

其中  $x$  为个人消费,  $e$  为获得收入而付出的努力, 假设  $\frac{\partial u}{\partial x} > 0, \frac{\partial^2 u}{\partial x^2} < 0, \frac{\partial u}{\partial e} < 0, \frac{\partial^2 u}{\partial e^2} < 0$ .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分析的,人们的需求除了物质之外,还有精神需求,尤其是马斯洛需求理论中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需求,自我价值的需求往往需要通过一定的社会地位实现. 因而在上述效用函数中,本文增加社会地位指标  $z$ , 个体获得的社会地位和付出的努力程度有关,而且社会地位也反映了人们的努力和自身能力投资的结果,设  $\frac{\partial u}{\partial z} >$

$0, \frac{\partial^2 u}{\partial z^2} > 0, \frac{\partial z}{\partial e} > 0, \frac{\partial^2 z}{\partial e^2} < 0$ . 由模型的上述基本假定可以获得如下结论:

假设 1 社会地位是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社会地位越高,人们感觉越幸福.

假设个体预算约束为

$$x = \lambda(1 - r)s(e, \delta) + (1 - \lambda)T \tag{3}$$

其中  $\lambda \in \{0, 1\}$  反映了劳动供给的外延边界,  $r$  代表劳动收入  $s(e, \delta)$  的单位税率,而  $s(e, \delta)$  依赖于努力程度  $e$  和个体能力/技术水平参数  $\delta$ . 假定  $\frac{\partial s}{\partial e}$

$> 0, \frac{\partial s}{\partial \delta} > 0, \frac{\partial^2 s}{\partial e \partial \delta} > 0$ , 以及  $s(0, \delta) = 0$ .  $T$  代表个体不进入劳动市场的一次性福利转移收入,通过整体劳动市场的收入所得税提供资金. 由于消费是收入的线性递增函数,则有  $\frac{\partial u}{\partial s} = \frac{\partial u}{\partial x} \frac{\partial x}{\partial s} > 0, \frac{\partial^2 u}{\partial s^2} = \frac{\partial^2 u}{\partial x^2} \frac{\partial x}{\partial s} < 0$ , 因此,可以得到幸福感和收入的如下

结论:

假设 2 收入对幸福感存在积极影响,但收入越高,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越不重要.

首先假定技术水平  $\delta$  是固定的外生的(比如反映教养、由遗传决定的智力因素)在  $\lambda = 1$  处,通过最大化效用函数可以确定最优努力水平  $e^* = e^*(\delta, r, \eta)$  和最优努力水平下的社会地位指标  $z^* = z(e^*)$ . 付出越多努力,也将获得越高的社会地位,从而进一步增加效用. 在劳动供给边界上,当且仅当成立时,个体会选择劳动供给  $\lambda = 1$

$$u[(1-r)s(e^*, \delta)]e^*z^* > u[T \rho z_0] \quad (4)$$

其中  $z_0$  代表初始的社会地位水平. 式(4)左端是关于  $\delta$  严格增函数,关于税率  $r$  的严格递减函数,可以断定,对任意严格正的税率产生的待再分配的  $T > 0$ ,一定存在某个努力水平值  $\hat{\delta} > 0$ : 当  $\lambda = 0$  时,  $\forall \delta < \hat{\delta}$ ; 当  $\lambda = 1$  时,  $\forall \delta > \hat{\delta}$ . 而且,存在该努力水平值  $\hat{\delta} > 0$  下的社会地位水平  $\hat{z}$ .

个体如果进入劳动力市场,需要确定其最优努力水平. 考虑更加现实的情况,即个体技术能力仅仅具有少部分外生特征(比如遗传决定的能力和天分),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个体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所决定的. 为了简化,假定不投资自身人力资本的个体的技术能力水平和社会地位不会提高,默认能力值为  $\delta < \hat{\delta}$ ,而且如果不投资,则社会地位  $z < \hat{z}$ . 另一方面,在能力上的投资的冲击不是决定性的,换句话说,投资可能失败,比如个体错误的投资了和劳动市场需求无关的技术能力.

假定投资数量  $H > 0$ ,能够提高能力参数的客观概率为  $\bar{p}$ ,而且  $\frac{\partial \delta}{\partial H} > 0, \frac{\partial^2 \delta}{\partial H^2} < 0, \frac{\partial z}{\partial H} > 0, \frac{\partial^2 z}{\partial H^2} < 0$ .

投资失败的概率为  $(1 - \bar{p})$ ,若投资失败,则个体保持其低的能力水平参数不变和社会地位不变. 存在个体投资成功的主观感知概率  $p$ ,个体投资自身人力资本  $H > 0$  后,期望效用为

$$p \times u[s(e^*, \delta)(1-r) - H e^* z^*] + (1-p) \times u[T - H \rho z_0] \quad (5)$$

其中  $e^*$  和  $z^*$  是此时给投资选择  $H$  并获得能力值  $\delta$  的最优努力水平和获得的社会地位水平,如果投资成功,  $\delta$  和  $e^*$  以及  $z^*$  都是关于  $H$  的增函数,从个体的视角来看,最大化式(5)得到的最优投

资水平  $H^*$  关于主观概率  $p$  严格递增.

个体另一个选择是不进行任何投资,即  $H = 0$ ,则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此时从确定性转移收入产生默认效用. 比较这两个状态,可以看出当且仅当成立,个体将会投资人力资本并进入劳动力市场

$$p \times u[s(e^*, \delta)(1-r) - H^* e^* z^*] + (1-p) \times u[T - H^* \rho z_0] > u[T \rho z_0] \quad (6)$$

在两种情况下,个体会较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第一,如果税率  $r$  很高,个体抗拒进行人力资本的大量投资;第二,如果投资成功获得较高能力的主观概率  $p$  很低,个体也会抗拒进行人力资本大量投资. 进一步的,从式(6)的条件可以推断出存在一个严格正的门槛水平  $\hat{p}$  对任意  $p < \hat{p}$ ,个体不会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且个体保持不对自身投资是最优的选择.

即使有严格的理性预期理论,仍然会出现投资成功的主观概率  $p$  与客观概率  $\bar{p}$  不同的情况. 低的  $p$  值反映了个人预期劳动力市场对自己的刚性,个人不期望自己和他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能够获得高收入回报. 个体预期如果其投资失败,如果他带着低的能力技术值  $\delta = \underline{\delta}$  进入劳动力市场,工资相对于自身努力的弹性将会很低. 在这个意义上,低的  $p$  值反映了一种被高收入机会排除的感觉. 相反地,对于很高的  $p$  值反映劳动力市场上向上流动的乐观预期,最终使得个体在自身人力资本上投资  $H^*$  并且随后付出  $e^*$  努力获得劳动力市场的高收入. 因此,模型中的主观概率  $p$  捕捉了主观感知的平等,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努力和市场收入之间,个体感知到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 人们主观感知的人力资本投资概率  $p$  越高,即人们公平感知越强,则报告的幸福水平也越高. 人们公平感知越强,则人们通过努力能预期社会地位提高和收入提高,从而获得更高的效用,也就会更幸福. 这意味着,收入和社会地位通过公平感知进一步影响人们的幸福感. 综上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假设 3 公平感知构成人们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人们的公平感知越强,幸福感越高.

假设 4 收入和社会地位不仅通过数额的多寡和层次的高低,也通过人们对其的公平感知影响主观幸福感.

## 2 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 2.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CLDS)。采用 2012 年首次正式调查的数据和 2014 年调查数据进行,该调查包括中国 29 个省

市(除港澳台、西藏、海南外) 2012 年完成村居问卷 303 份,家庭问卷 10 612 份和劳动力个体问卷 16 253 份; 2014 年完成 401 份村居问卷,家庭问卷 14 188 份,劳动力个体问卷 23 512 份。由于个体问卷中缺乏有关婚姻状况和民族的问题,本文将个体问卷整合了家庭问卷中相关信息,经过整理,去掉关注因素无回答现象,2012 年共有 8 451 个有效样本,2014 年共有 14 560 个有效样本。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	2012 年调查数据				2014 年调查数据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幸福感	4.139 4	1.291 7	1	6	3.706 5	0.889 0	1	5	
公平感	3.267 8	0.975 7	1	5	3.241 69	0.911 5	1	5	
总收入(单位:万元)	2.599 9	8.346 6	0.005	600	3.254 6	8.585 8	0.000 6	593	
教育状况	初中及以下	0.468 9	0.499 1	0	1	0.688 5	0.463 1	0	1
	高中/职业高中/大专	0.223 6	0.416 7	0	1	0.237 1	0.425 3	0	1
	大学本科及以上	0.307 5	0.461 5	0	1	0.074 5	0.262 5	0	1
目前为城市户口	0.250 1	0.433 1	0	1	0.230 1	0.420 9	0	1	
职业单位类型:体制内	0.177 5	0.382 1	0	1	0.168 8	0.374 6	0	1	
职业类别	大类 0 1	0.073 7	0.261 3	0	1	0.111 6	0.314 9	0	1
	大类 2	0.057 4	0.232 6	0	1	0.061 1	0.239 4	0	1
	大类 3 4	0.204 6	0.403 4	0	1	0.165 9	0.372 0	0	1
	大类 5	0.387 4	0.487 2	0	1	0.406 1	0.491 1	0	1
	大类 6 7 8 9	0.276 9	0.447 5	0	1	0.255 4	0.436 1	0	1
共产党员	0.093 8	0.291 6	0	1	0.094 9	0.293 1	0	1	
关系密切朋友数目	一个也没有	0.141 1	0.348 1	0	1	0.136 1	0.342 9	0	1
	1 个~5 个	0.376 1	0.484 4	0	1	0.379 5	0.485 3	0	1
	6 个~10 个	0.209 7	0.407 1	0	1	0.253 7	0.435 1	0	1
	11 个~15 个	0.076 1	0.265 2	0	1	0.051 4	0.220 8	0	1
	16 个以上	0.197 0	0.397 7	0	1	0.179 3	0.383 6	0	1
汉族	0.880 4	0.324 6	0	1	0.890 5	0.312 3	0	1	
年龄	43.06	12.61	15	85	44.587	12.647	15	114	
女性	0.454 1	0.498 0	0	1	0.440 0	0.496 4	0	1	
家庭户主	0.490 4	0.499 9	0	1	0.474 5	0.499 4	0	1	
婚姻状况	未婚	0.098 8	0.298 4	0	1	0.091 9	0.288 9	0	1
	已婚	0.861 9	0.345	0	1	0.866 2	0.340 4	0	1
信仰	基督教信仰	0.069 2	0.253 8	0	1	0.048 8	0.215 5	0	1
	佛道信仰	0.085 7	0.279 9	0	1	0.062 0	0.241 1	0	1
体质指数 BMI	22.405	3.396 8	8.019	45.138 89	22.429	3.662 4	7.258	44.365	
吸烟	0.366 0	0.481 7	0	1	0.333 8	0.471 6	0	1	
不健康程度	2.361 0	0.930 3	1	5	2.259 3	0.938 8	1	5	
被访者相貌	相貌普通(1-5)	0.367 3	0.482 1	0	1	0.292 8	0.455 1	0	1
	相貌较好(6-7)	0.459 7	0.498 4	0	1	0.484 0	0.499 8	0	1
	相貌出色(8-10)	0.173 0	0.378 3	0	1	0.223 2	0.416 4	0	1
相貌(1-10 分制)	6.039 1	1.533 3	1	10	6.361 1	1.466 5	1	10	

## 2.2 幸福感和公平感

本文采用有关幸福感的调查问题是:总的来说,您认为您的生活是否过得幸福?2012年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情况在1分~6分内进行打分,1代表很不幸福,6代表非常幸福。而2014年问卷中幸福感分值为1分~5分,其中1代表很不幸福,5代表非常幸福。居民2012年幸福感均值为4.1394,2014年为3.7065,从幸福感两端值来看,2014年居民感到非常不幸福的比例由2012年的3.21%降低到1.52%,2014年居民感到非常幸福的比例由2012年的17.26%提高到18.89%,但由于两年幸福感分值范围不同,比较意义不大。

调查问卷中,有关公平的问题是:您认为您目前的生活水平和您的努力比起来是否公平?1代表完全不公平,2代表比较不公平,3代表无所谓公平也无所谓不公平,4代表比较公平,5代表完全公平,被调查者在1分~5分内进行打分。这个问题衡量了人们对自身付出的努力之结果的公平感知,该问题两年的问卷设计相同,2014年居民公平感得分均值为3.2417,比2012年的3.2678略低。本文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列在表1中,描述性统计与不同层次幸福感的差异性检验<sup>②</sup>表明,居民公平感知不同,幸福感有显著差异,而且居民感到越公平,其幸福感水平越高。

## 2.3 收入和社会地位变量

2012年问卷调查了受访者2011年各类收入的总计值,2014年调查受访者2013年各类收入的总计值。2011年受访者收入均值为2.5998万元,2013年为3.2545万元,比2011年提高25.18%,人均收入年增长率约为12%。将收入按照20%、50%、80%、90%分位数分组,对各收入组受访者计算幸福感均值并对不同收入组幸福感差异性进行检验,表明随着收入增加,居民幸福感随之显著提高,即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就收入分布来看,2012年和2014年20%收入分位数均为年总收入0.6万元,而这两年80%分位数分别为3.2万元和4万元,90%分位数分别为5万元和6万元。也就是说,20%收入分位数两年来没有改变,表明人们的收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

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并未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增加。公平感差异性检验表明不同收入组的公平感差异也非常显著,即幸福感与公平感知高度相关,同时二者都和收入有关。

就社会地位的衡量而言,不存在统一的具体界定及相应的衡量指标。目前国内研究多采用人们对社会阶层的自我评价来测度,笔者认为,这一指标与幸福感过于接近,人们在进行主观评判时容易等同使用,而且对于如何改善人们对社会阶层的自我评价,也不易给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由此本文基于相关研究选用一些客观指标作为社会地位的代理变量。社会地位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在当前我国社会地位的特征是重视生存逻辑,表现为体制内外的地位分殊和城乡社会空间地位等级化<sup>[43]</sup>。因而,界定社会地位的客观指标,需要结合体制内外和城乡社会空间的分化。首先,考虑城乡身份;第二,职业不仅是收入的一定保证,也是人们自我实现和社会地位的基础,因而是公认的社会地位的代表指标<sup>[44]</sup>。一方面,将体制内外因素作为职业的一种分类,另一方面采用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0个职业大类指标;第三,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中,教育都在个人社会地位获得中起着积极的作用,是人们在社会阶层中向上流动的重要条件,而且教育是获得职业地位的重要条件<sup>[45]</sup>;第四,在中国社会的实际生活中“关系”的重要性众所周知,人际关系网络是个人地位一部分,能帮助个体获得或改变其社会角色和地位<sup>[46]</sup>;第五,共产党员身份意味着更多的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影响着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也增加了体制内身份的可能性<sup>[47]</sup>。综上,本文采用职业、教育、城乡户口、人际关系和党员身份这5个维度的指标作为社会地位的综合测量。

按照调查问卷,将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集体单位作为体制内类别,其他工作单位或务农作为体制外类别。问卷按照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职业分类,分为10个大类。大类0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大类1为专业技术人员,包括科学研究人员、工程/农业/飞机和船舶/卫生技术人员;大类2为经济、金融、法

<sup>②</sup> 因篇幅关系,各变量不同层次下幸福感差异性检验与公平感差异检验未在文中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律业务人员/教学、文艺、体育、新闻等专业技术人员; 大类 3 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大类 4 为商业、服务业人员; 大类 5 为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大类 6、7、8、9 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经初步统计分析, 发现大类 0 和 1 的人们幸福感指数非常接近, 大类 3 和 4 的幸福感指数也非常接近, 因此合并大类 0 和 1, 合并大类 3 和 4, 此外, 大类 6、7、8、9 为一类, 即本文将职业类别划分为五类。调查问卷中, 关于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初中、高中、职高/技校、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由于样本中硕士以上学历者仅占样本数的 0.31%, 因此将其合并到本科及以上学历中, 并视其为高学历者, 合并职高/技校和中专学历为一组, 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作为一组。问卷中有关人际关系的问题是: 在本地, 您有多少关系密切, 可以得到他们支持和帮助的朋友/熟人? 受访者按照以下类别选择: 一个也没有, 1 个~5 个, 6 个~10 个, 11 个~15 个, 16 个或 16 个以上, 本文将作为分类变量考察<sup>③</sup>。

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幸福感/公平感差异检验来看, 社会地位有关变量的不同类别下受访者幸福感和公平感差异非常显著(除了体制内外的公平感差异并不显著), 而且 2012 年和 2014 年结果基本一致(教育除外)。就教育而言, 2012 年样本显示随着教育水平提高, 幸福感先降低再升高; 而 2014 年调查却表明教育水平越高, 幸福感越强。城市户口居民幸福感水平高于农村户口。体制内幸福感指数显著高于体制外; 大类 2 人员幸福感指数最高, 其次为大类 0 和 1, 而大类 5 的人们幸福感水平最低。两次调查都显示共产党员的幸福感显著高于非党员; 关系密切的朋友数目越多, 幸福感越强, 其中 2014 年样本中有 11 个~15 个朋友者幸福感略有降低, 这可能和该组别样本较少有关。

#### 2.4 其他控制变量

现有文献研究普遍认为, 人口统计学特征如性别、年龄、宗教、民族、婚姻家庭、健康都是影响人们幸福感的因素, 因此, 将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考察。CLDS 数据调查中记录了访问员对被访者相貌的评价, 事实上, 相貌是人们的天生禀赋,

影响人们的自我评价和价值观。因此本文将相貌也作为控制变量。

婚姻状况分为单身、初婚/再婚有配偶、离异和丧偶三类, 其中 2014 年数据多了同居类别, 本文将其合并于单身组中从而和 2012 年数据测度保持一致; 现有幸福感研究文献中, 经常将是否宗教信仰作为控制变量, 多数都认为宗教信仰对幸福感影响不显著, 本文按照 CLDS 问卷设计, 将外来宗教和本土宗教进行了划分, 并将宗教信仰分为三类: 无宗教信仰、基督/天主/伊斯兰教信仰和佛道教信仰; 考虑到少数民族类别非常多, 而每一类中仅有极少数的群体, 因此本文合并所有少数民族为一类; 调查问卷中涉及健康状况的问题是: 您认为自己现在的健康状况如何? 1 代表非常健康, 5 代表非常不健康, 受访者在这 5 个分值内打分; 本文将体质指数 BMI 也作为健康指标, 其中 BMI 是根据受访者自己回答的身高和体重计算, 此外增加是否抽烟的生活习惯; 问卷中, 被访者的相貌是访问员在访问结束后对被访者的评价, 对被访者的相貌从 1-10 的分值中进行打分。初步研究发现相貌 5 分以下者对幸福感的影响区别不大, 因此, 本文将相貌分为 3 个等级进行考察, 1 分-5 分为相貌普通, 6 分-7 分为相貌较好, 8 分-10 分为相貌出色。

### 3 模型估计和结果分析

根据前述理论分析和假设, 为验证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Happiness_i = \alpha + \beta Fairness_i + \gamma Income_i + \lambda Fairness_i \times Income_i + \zeta X_i + \tau W_i + \varepsilon_i \quad (7)$$

$$Fairness_i = \delta Income_i + \varphi X_i + \varphi W_i + \mu_i \quad (8)$$

其中  $Happiness_i$  为样本中第  $i$  个受访者的幸福感得分;  $Fairness_i$  是第  $i$  个受访者的公平感知;  $Income_i$  是第  $i$  个受访者的上一年全年总收入;  $X_i$  是第  $i$  个受访者的社会地位因素;  $W_i$  是控制因素。因变量幸福感和公平感均为序数变量, 因此方程均设定为有序 Probit 模型。本文首先估计式 (7), 分析收入、社会地位和公平感知对幸福感的影响。考虑公平感知作为式 (7) 的解释变量, 很可

<sup>③</sup> 这是 2012 年问卷的问题设置, 2014 年问题设置的答案是密切关系朋友的具体数目, 为了数据的一致性, 本文将 2014 年的数据参照 2012 年进行了分类。

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为更准确考察公平感知对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的影响以及公平感本身对幸福感的影响, 将式(7)和式(8)联立: 即模型允许  $\varepsilon_i$  和  $\mu_i$  相关. 由于2012年和2014年问卷中幸福感采用不同分值测量, 本文对两年的样本分别估计进行对照, 并验证结果的稳健性.

### 3.1 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分析

本文首先对不同收入组的受访者建立幸福感方程, 将收入作为解释变量, 估计式(7), 其中收入取对数, 估计结果列在表2中. 表2的第(1)列~第(3)列是未分组的估计结果, 依次列出了估计方程中增加社会地位因素、公平感知和其他控制因素的回归结果; 第(4)列~第(12)列是按照收入分组的估计结果. 表2中收入分为三组, 将50%收入分位数以下作为低收入组, 这是因为2012年50%收入分位数仅为1.7万元, 月收入约为1400元, 2014年50%分位数为2万元, 月收入约1667元, 均接近当年最低工资水平<sup>④</sup>. 在这个收入以下, 人们生存压力较大, 生活质量对收入应当很敏感. 考虑到本文采用的数据是劳动力调查数据, 2012年收入90%分位数为5万元,

2014年为6万元, 月收入分别为4167元和5000元, 这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收入水平, 因此将收入50%分位数至90%分位数之间的群体作为中等收入组, 将收入90%分位数以上作为高收入组.

未分组数据的回归结果显示, 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 控制社会地位以及其他因素后, 仍然显示随着收入增加幸福感增加, 这和描述性统计相一致. 进一步分析不同收入组发现, 低收入组和中等收入组的收入系数都是显著的(除了2012年估计结果显示模型中控制了社会地位等因素后, 中等收入组中, 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再显著). 两年的估计结果都表明, 收入90%分位数以上的群体中, 幸福感对收入的变化并不敏感, 无论是单独回归还是控制社会地位等其他因素, 收入的系数基本都不显著. 一般而言,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者, 增加收入能显著提高其幸福感, 而收入90%分位数以上的群体, 收入水平较高, 基本生存压力不大, 按照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 此时人们的需求上升为更高的精神追求, 因而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不明显. 于是本文的研究假设2中的“收入越高, 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越不重要”得到证实.

表2 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of income on happiness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012年	不按照收入分组			低收入(50%分位数以下: 年总收入 ≤ 1.7万元)			中等收入(50%~90%分位数: 1.7万元 < 年总收入 ≤ 5万元)			高收入(90%分位数以上: 年总收入 > 5万元)		
收入	0.158*** (15.37)	0.0953*** (7.91)	0.0850*** (6.49)	0.106*** (5.44)	0.0591** (2.77)	0.0412 (1.85)	0.156** (2.77)	0.0496 (0.86)	0.0276 (0.47)	0.0543 (0.72)	0.0895 (1.13)	0.0772 (0.96)
N	8451	8451	8451	4245	4245	4245	3519	3519	3519	687	687	687
2014年	不按照收入分组			低收入(20%分位数以下: 年总收入 ≤ 2万元)			中等收入(50%~90%分位数: 2万元 < 年总收入 ≤ 6万元)			高收入(90%分位数以上: 年总收入 > 6万元)		
收入	0.138*** (18.65)	0.0946*** (10.67)	0.0695*** (7.28)	0.103*** (8.12)	0.0745*** (5.36)	0.0611*** (4.10)	0.309*** (5.93)	0.213*** (3.98)	0.210*** (3.82)	0.105 (1.85)	0.118* (2.03)	0.0962 (1.64)
N	14560	14560	14558	7866	7866	7864	5305	5305	5305	1389	1389	1389
社会地位	无	有	有	无	有	有	无	有	有	无	有	有
其他因素	无	无	有	无	无	有	无	无	有	无	无	有

注: \*\*\*表示0.1%水平上显著; \*\*表示1%水平上显著; \*表示5%水平上显著, 下面表格相同.

### 3.2 社会地位对幸福感的影响

本小节分析社会地位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 结果列在表3中. 表3的第(1)列~第(4)列是依

次增加收入、公平感知以及控制因素的估计结果. 社会地位5个维度的因素都对幸福感有影响; 职业方面, 体制内工作者幸福感显著高于体制外, 第

④ 不仅如此, 而且两年20%收入分位数以下的人们的收入水平变异不大, 难以体现收入的效应.



表 3 社会地位对幸福感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social status on happiness

变量		2012 年				2014 年			
		(1)	(2)	(3)	(4)	(5)	(6)	(7)	(8)
教育程度 (基准组: 初中及以下)	高中/职业高中/ 大专(中等教育)	0.019 8 (0.61)	0.010 2 (0.31)	0.025 5 (0.78)	0.024 9 (0.76)	0.070 5** (2.83)	0.040 7 (1.62)	0.060 9* (2.41)	0.065 2* (2.50)
	大学本科及以上 (高等教育)	-0.130*** (-4.78)	-0.115*** (-4.19)	-0.123*** (-4.49)	-0.098 7*** (-3.48)	0.149*** (3.40)	0.078 4 (1.77)	0.082 9 (1.86)	0.087 7 (1.90)
非农民身份		0.062 6 (1.84)	0.030 5 (0.89)	0.073 7* (2.15)	0.082 0* (2.34)	0.028 6 (1.05)	0.019 7 (0.72)	0.048 4 (1.76)	0.050 8 (1.80)
职业单位: 体制内		0.143*** (3.81)	0.145*** (3.85)	0.172*** (4.56)	0.182*** (4.77)	0.181*** (6.06)	0.177*** (5.93)	0.194*** (6.47)	0.194*** (6.36)
职业类别 (基准组: 大类 5: 农、林、 牧、渔、水 利业生产 人员)	大类 0, 1	0.239*** (4.93)	0.125* (2.48)	0.146** (2.88)	0.079 6 (1.53)	0.181*** (5.70)	0.070 5* (2.11)	0.092 2** (2.74)	0.047 5 (1.37)
		0.294*** (5.04)	0.196** (3.27)	0.208*** (3.47)	0.151* (2.41)	0.220*** (4.77)	0.129** (2.74)	0.141** (2.98)	0.087 2 (1.79)
	大类 3, 4	0.148*** (4.11)	0.0731* (1.97)	0.107** (2.86)	0.039 1 (0.98)	0.121*** (4.04)	0.035 8 (1.16)	0.074 6* (2.39)	0.040 5 (1.23)
		0.082 6** (2.75)	0.006 08 (0.19)	0.056 8 (1.79)	0.028 2 (0.84)	0.098 7*** (4.22)	0.001 86 (0.07)	0.046 9 (1.85)	0.026 2 (0.96)
共产党员		0.142*** (3.33)	0.130** (3.05)	0.093 0* (2.17)	0.094 3* (2.16)	0.145*** (4.32)	0.137*** (4.06)	0.087 4* (2.57)	0.089 2* (2.57)
关系密切 朋友数目 (基准组: 一个也没 有)	1 个~5 个	0.178*** (4.98)	0.164*** (4.57)	0.165*** (4.59)	0.164*** (4.50)	0.062 4* (2.23)	0.047 5 (1.69)	0.044 5 (1.58)	0.023 9 (0.83)
		0.279*** (7.07)	0.250*** (6.32)	0.224*** (5.62)	0.207*** (5.14)	0.195*** (6.50)	0.173*** (5.76)	0.168*** (5.54)	0.136*** (4.43)
	11 个~15 个	0.335*** (6.54)	0.310*** (6.03)	0.267*** (5.17)	0.255*** (4.90)	0.197*** (4.29)	0.172*** (3.74)	0.176*** (3.79)	0.154** (3.29)
		0.431*** (10.74)	0.403*** (9.98)	0.371*** (9.15)	0.357*** (8.73)	0.327*** (10.19)	0.312*** (9.69)	0.277*** (8.55)	0.235*** (7.12)
总收入对数			0.095 3*** (7.91)	0.077 6*** (6.40)	0.064 4*** (4.89)		0.094 6*** (10.67)	0.076 7*** (8.57)	0.055 7*** (5.79)
公平感 (基准组: 1-完全 不公平)	2			0.466*** (8.09)	0.439*** (7.56)			0.328*** (6.47)	0.284*** (5.58)
				0.652*** (11.61)	0.626*** (11.03)			0.488*** (9.97)	0.411*** (8.32)
	3			1.058*** (19.35)	0.983*** (17.77)			0.964*** (19.82)	0.867*** (17.65)
				1.480*** (19.07)	1.391*** (17.74)			1.686*** (23.59)	1.593*** (22.06)
有无其他控制因素		无	无	无	有	无	无	无	有
样本容量		8 451	8 451	8 451	8 451	14 560	14 560	14 560	14 558

二大类职业的从业人员(经济、金融、法律业务人员/教学、文艺、体育、新闻等专业技术人员)幸福感最高,均和描述性统计和比较检验一致;但 2014 年控制公平、收入以及其他控制因素后,职业方面仅有体制内外因素显著,这可能是职业大类因素和收入以及公平等问题的相关所致;教育

方面,增加公平感知与控制因素后,2012 年估计结果显示接受中等教育者幸福感最高,而接受高等教育者幸福感最低;2014 年显示接受中等教育者幸福感显著高于低层次教育者,而高等教育者也高于低层次教育者,但差异的显著差低于前者。总的来说,接受高等教育并未带来幸福感的显著

提高,这可能是因为高等教育者处于社会夹心层,向上流动的预期大,但压力也大。更值得关注的是,两年估计结果的差异可能意味着高等教育者在公平感知等方面存在变化,本文对不同教育层次的公平感知统计发现,2012年到2014年高等教育者公平感知提高的同时,中等教育者和低等教育者公平感知却在下降,侧面表明社会地位因素部分通过公平感知影响幸福感,即为本文的研究假设4;此外,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知高于农民;共产党员的幸福感知显著高于非党员;社会关系越好,即朋友数目越多,幸福感越强。两年数据估计中,除了教育对幸福感的影响有差异外,社会地位对幸福感的影响基本一致。综上,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1中“社会地位是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得到证实。

表3还显示,控制了公平感知后,尽管收入的影响仍然显著,但系数明显降低,这一方面说明公平感知影响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表明公平感知和收入之间存在交叉效应,为进一步分析社会地位对不同收入层次的人们幸福感的作用,特别是20%分位数以下极低收入群体中社会地位的影响,将收入按照20%、90%分位数分为三组<sup>⑤</sup>。结果发现中等收入群体较低收入群体,社会地位各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显著。考虑到社会地位的因素涉及较多,而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样本量太少,因而难以从单个变量的显著性分析社会地位各因素对幸福感的解释力度,因此本

文从模型的拟合优度的角度进行分析。从低收入组到高收入组,Pseudo R<sup>2</sup>随着收入的提高而逐渐增加,而且高收入组社会地位对幸福感的解释能力增加了一倍左右(收入从低到高,2012年数据估计Pseudo R<sup>2</sup>依次为0.0079、0.0134、0.0186;2014年依次为0.0073、0.0130、0.0145)。这与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1中“收入越高,社会地位对幸福感影响越大”相吻合。

### 3.3 公平感知对幸福感的影响

由描述性统计分析得知,人们感觉越公平,幸福感水平越高,二者正相关。前面还发现控制公平感知之后,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降低。因此先按照收入分组研究公平感知对幸福感的影响,估计结果列在表4中。人们的公平感知也是有序分类变量,因此先按照不同公平感知水平建立虚拟变量进行估计,再将公平感知作为连续性变量进行估计。分析表4发现,随着收入的提高,公平感知对幸福感的影响逐渐降低,也就是说,比较贫困的群体,其公平感知对幸福感的影响最大;然而收入90%以上分位数组估计结果显示公平感知对幸福感的影响再次回升,其影响程度和收入分位数20%~50%之间接近;2014年调查数据的估计结果和2012年接近。控制其他因素后,结论一致,为节约篇幅,控制其他因素后的估计结果不再列出。总之,无论人们收入处于什么水平,公平感知构成了影响人们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因而本文的研究假设3得到证实。

表4 不同收入组公平感知对幸福感的影响

Table 4 Effect of fairness perception on happiness under different income group

变量	2012年					2014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收入分位数	20%以下	20%~50%	50%~80%	80%~90%	90%以上	20%以下	20%~50%	50%~80%	80%~90%	90%以上	
公平感知作为连续变量	0.413*** (16.34)	0.309*** (13.81)	0.300*** (13.70)	0.262*** (7.38)	0.331*** (7.38)	0.432*** (19.36)	0.345*** (20.42)	0.331*** (16.69)	0.260*** (8.08)	0.395*** (11.40)	
公平感知分类(基准组:感觉完全公平)	2	0.632*** (5.28)	0.487*** (4.66)	0.302** (2.93)	0.453* (2.47)	0.471 (1.89)	0.306** (2.84)	0.363*** (4.42)	0.320** (3.10)	-0.0166 (-0.10)	0.551** (2.85)
	3	0.997*** (8.49)	0.619*** (6.12)	0.484*** (4.81)	0.459* (2.56)	0.593* (2.46)	0.635*** (6.14)	0.533*** (6.70)	0.370*** (3.67)	-0.0329 (-0.21)	0.684*** (3.72)
	4	1.413*** (12.37)	1.027*** (10.42)	0.863*** (8.85)	0.895*** (5.12)	0.992*** (4.27)	1.153*** (11.18)	0.970*** (12.24)	0.889*** (8.88)	0.470** (3.02)	1.194*** (6.59)
	5	1.716*** (11.20)	1.351*** (8.97)	1.316*** (8.95)	1.134*** (4.75)	1.569*** (5.58)	1.779*** (11.90)	1.665*** (14.38)	1.785*** (10.95)	1.039*** (4.42)	1.788*** (7.77)
	N	1836	2409	2526	993	687	2957	4909	3863	1442	1389

⑤ 为节约篇幅,不同收入组社会地位对幸福感影响的估计结果不再列出。

为分析公平感知如何影响收入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表 5 列出了不同公平感知水平下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无论人们感知的公平程度如何,收入对幸福感都有显著正影响(除了 2014 年完全公平组中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在 5%

水平上不显著)。两年的估计结果都显示,感觉完全不公平和比较不公平的群体相比较于感知公平的群体,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更大。这说明公平感知影响收入对幸福感的作用,也很可能意味着很低的收入水平是人们感觉不公平的重要因素。

表 5 不同公平感知水平下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

Table 5 Effect of fairness on happiness under different fairness perception level

变量	2012					2014				
	水平 1	水平 2	水平 3	水平 4	水平 5	水平 1	水平 2	水平 3	水平 4	水平 5
	(1)	(2)	(3)	(4)	(5)	(6)	(7)	(8)	(9)	(10)
总收入对数	0.255 ***	0.206 ***	0.132 ***	0.137 ***	0.131 **	0.125 **	0.181 ***	0.127 ***	0.123 ***	0.076
	(5.47)	(8.10)	(6.35)	(9.08)	(3.29)	(3.18)	(9.90)	(9.45)	(10.92)	(1.87)
N	423	1 560	2 163	3 944	361	538	2 629	4 640	6 282	471

### 3.4 联立方程模型估计

由于收入多寡、社会地位不同层次下,人们公平感知存在差异,即收入和社会地位与公平感之间存在相关,同时,幸福感和公平感知都是人们的主观感受,因而影响人们公平感知的不可预见因素与影响幸福感的不可预见因素存在相关性(即公平感知的内生性)从而导致本文研究的主要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偏误。为更稳健地估计收入、社会地位和相应的公平感知对幸福感的影响,这一节估计幸福感和公平感的联立方程模型。

前述讨论得知收入和公平感知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交叉效应,因而在模型中加入二者的交叉项,联立方程模型估计结果列在表 6 中。事实上,2012 年样本估计结果和 2014 年非常接近,而且联立方程中幸福方程系数估计和前述幸福方程的单方程估计结果也比较接近,说明本文模型估计结果是很稳健的。从幸福感方程估计结果来看,公平感作为解释变量非常显著,并且在幸福方程中,所有分类变量中公平感的系数绝对值也是最大的。2012 年和 2014 年系数估计均如此,这与阳义南和章上峰<sup>[39]</sup>的研究结果一致,这意味着公平感知对幸福感的影响非常重要,同时本文的研究假设 3 再次得到验证。

分析联立方程中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控制公平感知后,收入对幸福感仍然存在显著影响,相比较于表 2 中不按收入分组的回归结果,收入的系数变小了一些,表 2 第(3)列 2012 年收入系数的估计为 0.085 0,联立方程模型估计系数为 0.064 4;表 2 中 2014 年收入系数的估计为 0.069 5,

联立方程中系数估计为 0.055 7,说明一部分收入的效应被公平感知代替。表 6 第(3)列中收入和公平感的交叉效应显示,相对于感觉完全不公平者,感觉相对公平者的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均变小,表明公平感知影响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表 6 第(2)列、第(4)列、第(6)列、第(8)列的公平感方程显示,收入都是非常显著的,而且收入在公平感方程中系数的大小不亚于幸福感方程中收入系数。综上,公平感知不仅直接影响幸福感,也影响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而且收入不仅通过收入多寡直接影响幸福感,还通过体现收入分配的公平感知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因此本文研究假设 4 中“收入通过人们对其的公平感知影响幸福感”得到证实。

联立方程估计还显示,社会地位各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与表 3 的幸福感单方程估计结果一致。控制所有其他因素后,只有体制内外因素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而体制内人们的公平感却下降了,尽管不是十分显著;另一方面,公平方程还表明,相对于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其他各类从业人员的公平感知不同程度的下降了;体制内的人们因为各种保障较为健全而感到幸福,同时却因为体制内的个体可能存在不平等的发展机会等,从而感到不公平;同样,相对于从事农业类生产者,其他从业者在收入等方面的差异要大得多,不平等的机会更多,因而人们感受到更多不公平;教育对幸福感的影响和表 3 一样,而公平方程显示接受更多教育,人们的公平感知并没有提高。学术界公认教育程度具有实现公民的社会分层的作用<sup>[32]</sup>,更多的教育理应能够提高人们的修

表6 联立方程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6 The results of simultaneous equations

变量		2012年				2014年			
		无收入和公平交叉项		收入和公平交叉项		无收入和公平交叉项		收入和公平交叉项	
		幸福感	公平感	幸福感	公平感	幸福感	公平感	幸福感	公平感
		(1)	(2)	(3)	(4)	(5)	(6)	(7)	(8)
基准组为: 1 - 完全不公平	公平感2	0.439***		1.740***		0.284***		0.158	
		(7.56)		(3.44)		(5.58)		(0.37)	
	公平感3	0.626***		2.448***		0.411***		0.894*	
		(11.03)		(5.03)		(8.32)		(2.20)	
公平感4	0.983***		2.698***		0.867***		1.374***		
	(17.77)		(5.77)		(17.65)		(3.43)		
公平感5 - 完全公平	1.391***		2.402***		1.593***		2.220***		
	(17.74)		(4.11)		(22.06)		(4.01)		
基准组为: 1 - 完全不公平	收入* 公平感2			-0.138**				0.0129	
				(-2.59)				(0.29)	
	收入* 公平感3			-0.192***				-0.0501	
				(-3.77)				(-1.20)	
收入* 公平感4			-0.181***				-0.0524		
			(-3.69)				(-1.27)		
收入* 公平感5 - 完全公平			-0.107				-0.0650		
			(-1.74)				(-1.14)		
总收入对数		0.0644***	0.0878***	0.226***	0.0878***	0.0557***	0.0654***	0.0956*	0.0654***
		(4.89)	(6.49)	(4.79)	(6.49)	(5.79)	(6.84)	(2.38)	(6.84)
基准组为: 初中及以下	高中/职高/大专	0.0249	-0.0557	0.0261	-0.0557	0.0652*	-0.0611*	0.0655*	-0.0611*
		(0.76)	(-1.65)	(0.79)	(-1.65)	(2.50)	(-2.37)	(2.51)	(-2.37)
	大学本科及以上	-0.0987***	0.00925	-0.0965***	0.00925	0.0877	0.0286	0.0885	0.0286
		(-3.48)	(0.32)	(-3.39)	(0.32)	(1.90)	(0.63)	(1.91)	(0.63)
非农民身份		0.0820*	-0.130***	0.0841*	-0.130***	0.0508	-0.101***	0.0506	-0.101***
		(2.34)	(-3.63)	(2.40)	(-3.63)	(1.80)	(-3.64)	(1.79)	(-3.64)
职业单位: 体制内		0.182***	-0.0806*	0.179***	-0.0806*	0.194***	-0.0530	0.191***	-0.0530
		(4.77)	(-2.07)	(4.68)	(-2.07)	(6.36)	(-1.76)	(6.28)	(-1.76)
基准组为: 大类5: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职业类别: 大类0 <sup>1</sup>	0.0796	-0.0328	0.0821	-0.0328	0.0475	-0.0405	0.0465	-0.0405
		(1.53)	(-0.61)	(1.57)	(-0.61)	(1.37)	(-1.18)	(1.34)	(-1.18)
	职业类别: 大类2	0.151*	-0.0117	0.152*	-0.0117	0.0872	0.000986	0.0862	0.000986
		(2.41)	(-0.18)	(2.42)	(-0.18)	(1.79)	(0.02)	(1.77)	(0.02)
职业类别: 大类3 <sup>4</sup>	0.0391	-0.0851*	0.0422	-0.0851*	0.0405	-0.0877**	0.0399	-0.0877**	
	(0.98)	(-2.08)	(1.05)	(-2.08)	(1.23)	(-2.69)	(1.21)	(-2.69)	
职业类别: 大类6 <sup>7</sup> 8 <sup>9</sup>	0.0282	-0.120***	0.0294	-0.120***	0.0262	-0.133***	0.0246	-0.133***	
	(0.84)	(-3.46)	(0.87)	(-3.46)	(0.96)	(-4.91)	(0.90)	(-4.91)	
共产党员		0.0943*	0.112*	0.0959*	0.112*	0.0892*	0.129***	0.0903**	0.129***
		(2.16)	(2.50)	(2.20)	(2.50)	(2.57)	(3.76)	(2.60)	(3.76)

续表 6  
Table 6 Continue

变量		2012 年				2014 年			
		无收入和公平交叉项		收入和公平交叉项		无收入和公平交叉项		收入和公平交叉项	
		幸福感	公平感	幸福感	公平感	幸福感	公平感	幸福感	公平感
		(1)	(2)	(3)	(4)	(5)	(6)	(7)	(8)
基准组为: 关系密切朋友数目为 0	密切朋友数目: 1 个~5 个	0.164*** (4.50)	0.030 0 (0.80)	0.161*** (4.40)	0.030 0 (0.80)	0.023 9 (0.83)	0.016 4 (0.58)	0.023 4 (0.82)	0.016 4 (0.58)
	密切朋友数目: 6 个~10 个	0.207*** (5.14)	0.129** (3.13)	0.204*** (5.06)	0.129** (3.13)	0.136*** (4.43)	0.040 4 (1.33)	0.134*** (4.37)	0.040 4 (1.33)
	密切朋友数目: 11 个~15 个	0.255*** (4.90)	0.178*** (3.32)	0.252*** (4.84)	0.178*** (3.32)	0.154** (3.29)	0.013 0 (0.28)	0.151** (3.21)	0.013 0 (0.28)
	密切朋友数目: 16 个以上	0.357*** (8.73)	0.159*** (3.80)	0.354*** (8.66)	0.159*** (3.80)	0.235*** (7.12)	0.111*** (3.39)	0.233*** (7.05)	0.111*** (3.39)
民族为汉族		0.065 5 (1.63)	-0.097 7* (-2.38)	0.067 1 (1.67)	-0.097 7* (-2.38)	0.043 2 (1.37)	-0.077 6* (-2.47)	0.042 3 (1.34)	-0.077 6* (-2.47)
年龄		-0.038 0*** (-5.75)	-0.014 1* (-2.09)	-0.037 3*** (-5.64)	-0.014 1* (-2.09)	-0.023 4*** (-4.69)	0.002 52 (0.51)	-0.023 1*** (-4.64)	0.002 52 (0.51)
年龄平方		0.000 454*** (6.32)	0.000 273*** (3.70)	0.000 444*** (6.18)	0.000 273*** (3.70)	0.000 293*** (5.58)	0.000 071 2 (1.37)	0.000 291*** (5.53)	0.000 071 2 (1.37)
女性		0.131*** (3.71)	0.032 0 (0.88)	0.129*** (3.63)	0.032 0 (0.88)	0.092 7*** (3.49)	-0.053 0* (-2.01)	0.092 3*** (3.48)	-0.053 0* (-2.01)
基准组为: 离异/丧偶	单身	0.033 7 (0.44)	0.229** (2.94)	0.029 4 (0.39)	0.229** (2.94)	0.013 3 (0.21)	-0.001 34 (-0.02)	0.017 8 (0.28)	-0.001 34 (-0.02)
	已婚有配偶	0.452*** (7.50)	0.148* (2.41)	0.450*** (7.47)	0.148* (2.41)	0.305*** (5.82)	0.011 6 (0.22)	0.310*** (5.91)	0.011 6 (0.22)
家庭户主		-0.144*** (-4.91)	-0.027 8 (-0.93)	-0.144*** (-4.90)	-0.027 8 (-0.93)	-0.052 3* (-2.25)	-0.056 8* (-2.46)	-0.052 2* (-2.24)	-0.056 8* (-2.46)
基准组为: 无宗教信仰	基督教	0.264*** (5.22)	0.115* (2.20)	0.262*** (5.18)	0.115* (2.20)	0.222*** (4.93)	-0.072 2 (-1.62)	0.224*** (4.96)	-0.072 2 (-1.62)
	佛道	0.066 9 (1.61)	-0.088 5* (-2.09)	0.064 0 (1.54)	-0.088 5* (-2.09)	0.056 6 (1.50)	0.009 31 (0.25)	0.055 9 (1.48)	0.009 31 (0.25)
体质指数 BMI		0.018 2*** (5.13)	0.000 773 (0.21)	0.018 3*** (5.15)	0.000 773 (0.21)	0.007 70** (3.03)	0.002 31 (0.92)	0.007 59** (2.99)	0.002 31 (0.92)
不健康程度		-0.247*** (-17.95)	-0.173*** (-12.40)	-0.247*** (-17.94)	-0.173*** (-12.40)	-0.215*** (-20.51)	-0.168*** (-16.34)	-0.214*** (-20.45)	-0.168*** (-16.34)
吸烟		0.053 0 (1.68)	-0.075 7* (-2.34)	0.051 3 (1.63)	-0.075 7* (-2.34)	0.002 63 (0.11)	-0.036 3 (-1.53)	0.001 08 (0.05)	-0.036 3 (-1.53)
基准组: 相貌普通	相貌较好	0.112*** (4.31)	0.051 5 (1.93)	0.114*** (4.38)	0.051 5 (1.93)	0.138*** (6.46)	0.075 8*** (3.58)	0.138*** (6.47)	0.075 8*** (3.58)
	相貌出色	0.167*** (4.70)	0.061 3 (1.68)	0.171*** (4.79)	0.061 3 (1.68)	0.244*** (9.16)	0.129*** (4.91)	0.245*** (9.21)	0.129*** (4.91)
基准组为: 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	-0.070 4* (-2.37)	-0.160*** (-5.26)	-0.071 4* (-2.40)	-0.160*** (-5.26)	0.042 5 (1.80)	-0.030 6 (-1.30)	0.042 8 (1.81)	-0.030 6 (-1.30)
	西部地区	-0.035 3 (-0.70)	-0.209*** (-5.26)	-0.039 5 (-0.90)	-0.209*** (-5.26)	0.014 9 (0.37)	-0.139*** (-3.53)	0.015 6 (0.40)	-0.139*** (-3.53)
N		8 451				14 560			

养,能够提高社会地位,获得更公平的机会,幸福感应该更强。然而近年来我国教育被过分功利化,尤其高等教育的群体,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社会,功利化的教育倾向使得人们接受教育的目的变得狭隘,当人们付出更多机会成本接受更高的教育却没有相应回报的时候,就会产生不公平的感受,进而影响幸福感;幸福方程中农民身份的估计结果和表3接近,而农民的公平感显著高于城市居民。公平感知具有强烈的相对性,是源于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如果所有地区的劳动支出或贡献不变,那么人均收入较低的经济落后地区就会有更大的不公平感;但是,如果这种低收入是劳动支出或贡献差异造成的,那么不公平感就会降低。因此,农民有更高的公平感和更低幸福感表明了我国人民劳动支出的城乡差异仍然很大;此外,共产党员的公平感也显著高于非党员,这可能是因为共产党员有更积极的参与社会管理的意愿,对社会制度和经济现状具有更强的认同性,从而其公平感知会更强一些;人际关系方面,朋友数目越多,其公平感也越强,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幸福感。密切关系朋友数目越多,参与的社会活动也越多,对制度和社会现象有更强的接受和协调能力,从而公平感和幸福感也越高。综上,就社会地位各个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来说,本文的研究假设4中“社会地位通过人们对其的公平感知影响主观幸福感”也得到了证实。

其他控制因素方面:年龄对幸福感的影响呈U型,随着年龄的增加,幸福感先降低再提高。家庭户主的幸福感显著降低;女性幸福感显著高于男性;已婚有配偶者幸福感显著高于单身者和离异/丧偶者;体质指数BMI越高,幸福水平越高,不健康程度越高,幸福感越低;抽烟者的幸福感高于非抽烟者。这些控制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和文献研究基本一致。幸福方程显示汉族居民幸福感高于少数民族,但不显著;本文发现信仰对幸福感的影响也是显著的,有宗教信仰者幸福感显著高于没有宗教信仰者,而且基督教类信仰者幸福感显著高于佛道教信仰者;相貌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相貌越好,幸福感越强。

### 3.5 幸福感的影响分解

前面分析了收入、社会地位和公平感知对幸

福感的影响,这节对解释幸福感的几类因素进行综合评价。首先将幸福感依次对收入、社会地位、公平感知以及控制因素进行OLS回归,再进行整体回归,然后采用各个单独回归的 $R^2$ 占整体回归 $R^2$ 的比率作为各类因素解释幸福感的比例。为了对分解结果的合理性和可靠性进行验证,本文也采用Shorrocks<sup>[48]</sup>提出的基于线性回归和有序Probit模型的夏普利值分解方法进行计算<sup>⑥</sup>,发现基于OLS估计的线性回归方程计算的比例和夏普利值分解结果非常接近,说明本文的分解是可靠的。夏普利值方法主要是考虑了各类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影响,使结果中各类因素占比之和为100%,基于本文的研究,公平感知对幸福感不仅存在直接影响,还存在收入、社会地位经由公平感知的间接影响,因此根据基于OLS估计的线性回归方程 $R^2$ 的分解结果绘制图2(和引言中的图1相对应)。图2中连线左边数字为根据2012数据年测算的各类因素解释幸福感的比例,连线右边数字表示2014年测算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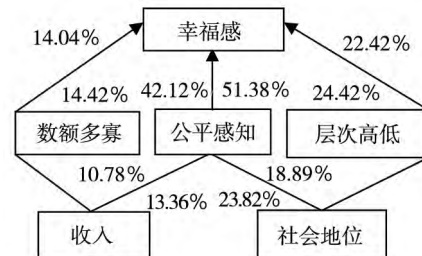


图2 收入、社会地位与公平感知解释幸福感比重  
Fig. 2 The decomposition of income, social status, fairness perception on happiness

从图2可以看出,1)现阶段,收入、社会地位及其相应的公平感知对幸福感的解释作用达到80%以上,而且公平感知对幸福感的影响最大,社会地位因素次之,收入最弱;2)公平感知对幸福感的解释力度非常大,而且成上升趋势,2014年公平感知对幸福感的影响超过50%,并超过了所有的控制变量之和的影响,这和方程估计中公平感知系数最大相呼应;3)相对于收入而言,社会地位对幸福感的影响更加重要;4)公平感知对幸福感的影响日益重要,2014年比2012年增加了9个百分点(42.12%到51.38%);5)就收入分配

⑥ 为节约篇幅,夏普利值分解结果不再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来说,2014 年相对于 2012 年,人们对收入不公平的感觉明显加大(由 10.78% 提高至 13.36%); 6) 人们对社会地位的公平感知已经高于对收入的公平感知(2014 年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公平感知占比分别为 18.89% 和 13.36%)。

#### 4 结束语

本文从公平感知视角,研究收入和社会地位对幸福感的影响,在建立理论模型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证实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整体而言,收入对幸福感有正的影响,但随着收入的提高,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逐渐不重要;公平感知影响幸福感,即人们感觉越公平,幸福感越强,这些结论与既往研究基本一致。另外,研究还发现: 1) 社会地位不仅影响幸福感,而且社会地位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贡献度高于收入,社会地位对幸福感的影响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强; 2) 公平感知对幸福感的影响日益重要,其对幸福感的影响已经大于收入和社会地位,收入多寡、社会地位不同层次的人们具有不同的公平感知,进而影响幸福感; 3) 公平感知影响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即感觉较公平者相比于感觉不公平者,其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变小,并且公平感知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贡献度最大; 4) 人们对收入不公平的感知呈增加趋势。

#### 参考文献:

- [1] Ferrer i, Carbonell A, Ramos X.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J].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14, 28(5): 1016 - 1027.
- [2] Easterlin R A.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89 - 125.
- [3] Easterlin R A. Will raising the income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 [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995, 27(1): 35 - 48.
- [4] Easterlin R A. Life cycle welfare: Trends and differences [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1, 2(1): 1 - 12.
- [5] Frey B S, Stutzer A. Happiness,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 [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0, 110(466): 918 - 938.
- [6] Fuentes N, Rojas M. Economic theor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Mexico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1, 53(3): 289 - 314.
- [7] Conceição P, Bandura R. Measur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A Summary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R].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New York: UNDP Research Paper, 2008.
- [8] 刘军强,熊谋林,苏阳. 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 CGSS 数据的追踪研究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 (12): 82 - 102.  
Liu Junqiang, Xiong Moulin, Su Yang. National sense of happiness in the economic growth period: A study based on CGSS

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背景下,我国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出现了同欧美发达国家类似的幸福悖论现象,因而本文的研究也为 Easterlin 幸福悖论增加了阐释的角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公平感在幸福感中居高的贡献度及其提升趋势,应该是与社会地位分化、收入分配不公以及缺乏安全感等不稳定因素有关,也是我国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其他社会危机的一个明显信号。这是以往同类研究未有发现或特别提及的一个结果,由此还产生了今后加强这方面监测、研究,以提高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性。

如何提升我国居民幸福感是各界日益关注的课题。本文认为社会和政府进一步改革应该着重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人们的幸福感不会因为收入增速降低而受到显著影响,现阶段更重要的是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比如教育的去功利主义改革、住房市场化改革、加强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进行体制内外双轨制的改革等,确保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平等地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红利,确保个人平等发展的权利;第二,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影响贫困群体不公平感和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是极低的收入水平。因而,应该提高贫困群体的收入,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医疗、教育和养老保障等,甚至,国家和政府可以考虑对低收入群体直接进行经济补贴。

- data[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2, (12): 82–102. (in Chinese)
- [9] Bartolini S, Sarracino F. The dark side of Chinese growth: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and well-being in times of economic boom [J]. *World Development*, 2015, 74(6): 333–351.
- [10] Easterlin R A, Morgan R, Switek M, et al. China's life satisfaction, 1990–2010 [J]. *Economic Scienc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2, 109(25): 9775–9780.
- [11] 周绍杰, 王洪川, 苏 杨. 中国人如何能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基于中国民生指数调查 [J]. *管理世界*, 2015, (6): 8–21.  
Zhou Shaojie, Wang Hongchuan, Su Yang. An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SURCEY of China's society: How can the Chinese people gain a higher level of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J]. *Management World*, 2015, (6): 8–21. (in Chinese)
- [12] 吴 菲. 更富裕是否意味着更幸福? 基于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2003–2013) [J]. *社会*, 2016, (4): 157–185.  
Wu Fei. Wealthier and happier? A cross-sectional time-series analysis of easterlin paradox in China (2003–2013) [J].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6, (4): 157–185. (in Chinese)
- [13] Daniel Kahneman, Alan B, Krueger. Developments in the measure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6, 20(1): 3–24.
- [14] 罗楚亮. 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J]. *财经研究*, 2009, (11): 79–91.  
Luo Chuliang. Absolute income, relative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the sample data of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s in China [J].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09, (11): 79–91. (in Chinese)
- [15] 李清彬, 李 博. 中国居民幸福—收入门槛研究—基于 CGSS2006 的微观数据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3, (3): 36–52.  
Li Qingbin, Li Bo. Study on the happiness-income threshold of Chinese people [J].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2013, (3): 36–52. (in Chinese)
- [16] Ferrer-i-Carbonell A. Income and well-be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mparison income effect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 89(5): 997–1019.
- [17] Alberto Alesina, Rafael Di Tella, Robert MacCulloch.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Are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different?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1, 88(9–10): 2009–2042.
- [18] Bjørnskov C A, Dreher J, Fischer A. Cross-country determinants of life satisfaction: Exploring different determinants across groups in society [J].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2006, 30(1): 119–173.
- [19] Clark Andrew E, Frijters Paul, Shields Michael A. Relative income, happiness, and utility: An explanation for the easterlin paradox and other puzzl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8, 46(1): 95–144.
- [20] Graham C, Felton A. Does inequality matter to individual welfare: An exploration based on happiness surveys in Latin America [J].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2006, 4: 107–122.
- [21] Grosfeld I, Senik C. The emerging aversion to inequality [J].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010, 18: 1–26.
- [22] 何立新, 潘春阳. 破解中国的“Easterlin 悖论”: 收入差距、机会不均与居民幸福感 [J]. *管理世界*, 2011, (8): 11–22.  
He Lixin, Pan Chunyang. Uncover the “Easterlin paradox” of China: Income gap,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happiness [J]. *Management World*, 2011, (8): 11–22. (in Chinese)
- [23] 鲁元平, 王 韬. 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与国民幸福感—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J]. *经济学(季刊)*, 2011, (4): 1437–1458.  
Lu Yuanping, Wang Tao. Income inequality, cri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n empirical study from China [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11, (4): 1437–1458. (in Chinese)
- [24] 王 鹏. 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1, (3): 93–101.  
Wang Peng. The impa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data [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11, (3): 93–101. (in Chinese)
- [25] Jiang S, Lu M, Sato H. Identity,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 [J]. *World Development*, 2012,



- 40(6): 1190 - 1200.
- [26]张 辉. 相对收入差距与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的数据分析[J]. 公共管理评论, 2013, 15(2): 90 - 101.
- Zhang Hui. The relative income gap and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hinese residents: Based on data analysis of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Chinese society[J].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3, 15(2): 90 - 101. (in Chinese)
- [27]申 云, 贾 晋. 收入差距、社会资本与幸福感的经验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 2016, (7): 100 - 110.
- Shen Yun, Jia Jin. An empirical study on happiness, income gap and social capital[J].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2016, (7): 100 - 110. (in Chinese)
- [28]黄嘉文. 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J]. 社会, 2016, (2): 123 - 145.
- Huang Jiawen. A study on the effe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happiness and its mechanism[J].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6, (2): 123 - 145. (in Chinese)
- [29]咎宝毅. 社会地位与角色[J]. 社会, 1987, (1): 5 - 7.
- Zan Baoyi. The social status and role[J].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7, (1): 5 - 7. (in Chinese)
- [30]De Botton A. Status Anxiety[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4.
- [31]Haller M, Hadler M. How social relations and structures can produce happiness and unhappiness: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6, 75(2): 169 - 216.
- [32]史耀疆, 崔 瑜. 公民公平观及其对社会公平评价和生活满意度影响分析[J]. 管理世界, 2006, (10): 39 - 49.
- Shi Yaojiang, Cui Yu. Citizen's view on fairness and its influence on assessment to social fairness and living satisfaction[J]. Management World, 2006, (10): 39 - 49. (in Chinese)
- [33]闰丙金. 收入、社会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J]. 统计研究, 2012, (10): 64 - 72.
- Run Bingjin. Income, self-identified stratum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J]. Statistical Research, 2012, (10): 64 - 72. (in Chinese)
- [34]Hayek F A. The Road to Serfdom[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 [35]Hopkins E. Inequality, happiness and relative concerns: What actually is their relationship? [J].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2008, 6(4): 351 - 372.
- [36]Bjørnskov C, Dreher A, Fischer J A V, et al.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Income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Do Fairness Perceptions Matter? [C]. Courant Research Centre PEG, Goettingen, Germany, 2009.
- [37]袁 正, 郑 欢, 韩 骁. 收入水平、分配公平与幸福感[J]. 当代财经, 2013, (11): 5 - 15.
- Yuan Zheng, Zheng Huan, Han Xiao. Income level,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sense of happiness[J]. Contemporary Finance & Economics, 2013, (11): 5 - 15. (in Chinese)
- [38]孙计领. 收入不平等、分配公平感与幸福[J]. 经济学家, 2016, (1): 42 - 49.
- Sun Jiling. Income inequality, distribution of fairness and happiness[J]. Economist, 2016, (1): 42 - 49. (in Chinese)
- [39]阳义南, 章上峰. 收入不公平感、社会保险与中国国民幸福[J]. 金融研究, 2016, (8): 34 - 50.
- Yang Yinan, Zhang Shangfeng. Income distribution unfairness, social insurance and happiness of the Chinese[J].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2016, (8): 34 - 50. (in Chinese)
- [40]李 俊. 城市住房阶层的幸福感与公平感差异[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 46 - 57.
- Li Jun. The difference of happiness and justice perception in urban housing stratum[J]. Journa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7, (1): 46 - 57. (in Chinese)
- [41]冯俊文. 基于序数信息的博弈理论[J]. 管理科学学报, 2002, 5(4): 83 - 87.
- Feng Junwen. Game theory with ordinal data input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02, 5(4): 83 - 87. (in Chinese)
- [42]Blanchflower David G, Oswald Andrew J. 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 88(7-8): 1359 - 1386.
- [43]周兆海, 邬志辉. 社会地位的内涵、演进及其类型——兼论我国当代社会地位的生成逻辑[J]. 理论月刊, 2015, (7): 142 - 145.
- Zhou Zhaohai, Wu Zhihui. The connotation, evolution and type of social status: Also on the generation logic of social status

- in contemporary China [J]. *Theory Monthly*, 2015, (7): 142 – 145. (in Chinese)
- [44] 李路路. 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双重再生产”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 (6): 105 – 118.
- Li Lulu.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es in stratification structure: Dual reproduction of the pattern of relative inter-strata relations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2, (6): 105 – 118. (in Chinese)
- [45] 仇立平, 肖日葵. 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获得——基于上海市的实证研究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 192(6): 121 – 135.
- Qiu Liping, Xiao Rikui. Cultural capital and status attainment: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in Shanghai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1, 192(6): 121 – 135. (in Chinese)
- [46] 翟学伟. 个人地位: 一个概念及其分析框架——中国日常社会的真实建构 [J]. *中国社会科学*, 1999, (4): 144 – 158.
- Zhai Xuewei. Personal status: Beyond social statu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ies in China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99, (4): 144 – 158. (in Chinese)
- [47] 张 翼. 中国人社会地位的获得——阶级继承和代内流动 [J]. *社会学研究*, 2004, (4): 76 – 90.
- Zhang Yi. The attainment of Chinese status: Class succession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J]. *Sociological Studies*, 2004, (4): 76 – 90. (in Chinese)
- [48] Shorrocks A. Inequality decomposition by factor components [J]. *Econometrica*, 1982, 50(1): 193 – 211.

## Income , social status , and happiness: Fairness perception perspective

*XU Shu-yi , CHEN Ping\**

Lingnan ( University) College , Sun Yat-sen University , Guangzhou 510275 ,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irness ,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income and social status on the happiness of Chinese people. A theoretical model is first established to make the analysis and then an empirical study is made using the data of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of ( CLDS) 2012 and 2014. This study shows that: 1) generally speaking , incom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happiness , but the sensitivity of the income to happiness decreases with income; 2) social statu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happiness ,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happiness in China exceeds that of income , and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status on happiness increases with income; 3) the effect of fairness perception on happines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 and even shows greater effect than that of income and that of social status. Collectively , this paper gives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of this phenomenon and some proposals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systems in China.

**Key words:** happiness; fairness perception; income; social status